

学者风采

“全球南方”现代化：在历史机遇中开辟多元发展新路径

文/徐秀军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发

“全球南方”崛起性群体为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崛起是“全球南方”崛起最为重要的体现，为“全球南方”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9年“全球南方”国家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达到50.7%，实现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超越；2024年，这一比重达到60.1%，也就是说，“全球南方”国家的GDP是西方发达国家的1.5倍。按市场汇率换算，2024年“全球南方”国家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为41.5%，较2000年提高了20.4个百分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1950—2024年间，“全球南方”国家货物进口额占世界的比重由29.4%提高到41.8%，货物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由34.0%提高到45.5%；1990—2023年间，每年流入“全球南方”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从336.04亿美元增加到8674.17亿美元，增长了约25倍。这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南方”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长，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

与此同时，“全球南方”迈上政治再崛起进程，并因此拥有了自主探

表重要讲话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当前，“全球

南方”迎来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遇，成为世界现代化的重要增长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更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与重大的世界意义，为“全球南方”探索符合各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参照，注入了强劲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中外比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徐秀军

索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再盲目追随发达国家，这一趋势在乌克兰危机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国际舞台上，“全球南方”国家更加积极谋求政治自主，在全球问题上更加鲜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全球南方”国家掀起的民族独立浪潮，当时“全球南方”谋求独立自主的立场与行动，意味着“全球南方”的政治“再崛起”。同时，在大国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性也随之提升。“全球南方”由此步入以群体性话语权提

升为标志的全方位崛起新阶段。当今时代，“全球南方”国家更有能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拥有选择何种现代化道路的发言权。“全球南方”现代化的多元化发展是“全球南方”经济崛起的必然体现，并赋予世界现代化进程鲜明的时代特征。

“全球南方”机制化合作为现代化提供对话平台

长期以来，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合作机制控制着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而有影响力的“全球南方”合作平台十分有限。1999年9月，七国集团央行行长和财长宣布成立包括主要“全球南方”国家的二十国集团央行行长(G20)和财长会议机制。2008年全球国际金融危机后，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并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上被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

要论坛。G20地位的提升既是“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的重要反映，也为“全球南方”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2023年9月，G20领导人新德里峰会上，非盟成为G20正式成员。并且，从2022年起，“全球南方”国家连续四年担任G20峰会主办国，展现了“全球南方”在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

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更加

注重联合自强，建立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南南合作平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砖合作机制。自金砖国家升级为峰会机制后，金砖合作不断发展壮大，并已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南方”合作平台。继南非于2011年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后，2024年金砖合作机制面向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进行了新一轮扩员。2025年，金砖合作机制将

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古巴、乌干达、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确定为伙伴国，并吸纳印尼为正式成员。金砖合作机制依托政治安全、经贸财金和人文交流“三轮驱动”的合作架构，为“全球南方”携手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交流平台。此外，东盟、非盟、阿盟、拉共体、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为推动“全球南方”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注入强大动能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跃升。2012年至2024年，中国GDP从53.9万亿元增长到134.9万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按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量达18.75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30%，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引擎，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造福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中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20年年底，实现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每年减贫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数量，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中华民族实现了“小康”这个千年梦想。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1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深刻表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探索出来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和平之路、发展之路、繁荣之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不仅鼓舞了“全球南方”携手推进现代化的信心与底气，更为“全球南方”现代化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也将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中外比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以社会政策高质量发展 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文/韩克庆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社会政策是一个囊括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劳动就业、生态环境、个人社会服务在内的政策系统，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配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健全社会政策体系，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更加广义的范畴构建社会政策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我国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政策体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突出表现在：一是社会政策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有关社会政策的大政方针在政府工作报告、党中央的历次全会公报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二是社会政策的覆盖范围越来越

大，受益对象越来越多；三是对社会政策的财政投入稳步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前社会政策体系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主要包含了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补贴制度等，还是属于社会政策的范畴，并没有上升到与经济政策甚至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这些基本制度相匹配的高度来进行制度建设，未来需要从更加广义的范畴建设社会政策体系。

创新社会政策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在部门沟通协调、制度系统集成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短板和不足。我国社会政策体系建设，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部署和实现路径，加强部门沟通，促进制度的系统集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在此之前，党中央就对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这实际上是对既有的社会政策体制机制所做出的重大改革。同样，在具体的制度运行方面，也需要打破制度之间的壁垒，更好地形成社会政策

体系高效运行的体制机制。

一是增强问题意识，创新社会政策体制机制建设。增强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制度的目标定位是否清晰、目标群体的遴选是否明确、福利资源的递送或者社会政策资源的递送是否通畅、财政投入的优先顺序是否合理等几个方面。同时，还要避免出现制度的碎片化、福利

叠加、福利悬崖等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这些制约制度有效运行的问题也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二是提高行政效率，保证制度运行的公开透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

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在社会政策的体制机制上做出合理安排，通过有效的人员配备提升行政效率，增加制度运行的透明度，更好地把社会政策的各项制度安排好。健全的司法系统、高效率的政府科层组织、良好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都是高效透明的社会政策运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社会政策高质量发展

首先，深化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重新认识和定位社会政策的目标，把社会政策嵌入到国家的基本制度框架当中，使其成为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主体部分。为此，一是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构建更加广义的社会政策体系；二是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尊重世代传承的良好风俗习惯，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吻合的价值认同；三是借鉴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成功实践，学习西方已有的社会政策成熟理论，创造中国本土化的制度体系和话语体系。

其次，健全社会政策体系的制度内容。社会政策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无论是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还是与个体及其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都是社会政策需要关注的内容。同时，不

能仅仅停留在狭义的理解范畴，单纯从社会救助或者社会保障的相关制度安排来推进，要突破当前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体制机制，从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公共住房、医疗卫生、免费教育、环境保护这些更广泛的制度内容上进行定位和设计。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政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更大的功效。

最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政策

的制度文明新形态。纵观社会政策的演进历程就会发现，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制度安排，创造了崭新的制度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就要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的制度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既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又积极吸收福利国家既有的先进经验，还能够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突破思想上的禁锢和制度上的误区，创造出既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又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制度文明新形态，这必将是构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形成中国特色社会政策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中之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